

## 藏医药学毒性理论的文献研究\*

王璞<sup>1</sup>, 董燕飞, 吴嘉瑞, 盛晓光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 北京 100102)

**[摘要]** 目的: 通过整理研究藏医药学经典文献中对毒的记载和论述, 为藏药安全使用提供借鉴和理论依据。方法: 通过收集整理藏医药学经典文献有关毒的记载, 探讨藏医药学“毒”概念的出现、毒性理论的雏形、毒性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 将零散的理论梳理形成体系。结果: 藏医药学对毒性理论有其独特的认识, 认识过程分为萌芽、发展、成熟和完善4个时期。对“毒”的定义和分类以及减毒理论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结论: 历代藏医药典籍对“毒”的认识主要有3种: 有毒就有药; 毒是所有可以导致人体疾病的物质与形式; 毒是药物的毒副作用。

**[关键词]** 民族医药; 藏族医药; 毒性; 文献研究

中图分类号: R29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23(2011)05—0018—03

藏医药学有着悠久的历史, 是我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实践内容。其中藏医药学对“毒”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认识与阐述; 对减毒也有记载。但是目前未见到较全面的藏医药学毒性理论的系统梳理和研究。通过对藏医药学经典文献中毒性理论的系统整理为安全使用藏药提供借鉴和理论依据。

### 1 藏医药学对“毒”的认识

公元前126年泽拉嘎玛约德与聂赤赞普述说“有毒何以治?”, “有毒就有药”, 用解毒药<sup>[1,2]</sup>。早在几千年以前, 藏医药学对药的认识已明确为: “是药必是毒, 是毒必是药, 其能用当为良药, 反之则为夺命鬼”<sup>[3]</sup>。可见藏医药学认为“毒”与“药”是不可分割的。通过对藏医药学经典文献整理发现藏医药毒性理论的认识过程大体可以分为萌芽、发展、成熟和完善4个时期。

#### 1.1 萌芽时期

成书于公元八世纪的《月王药诊》是现存最早的藏医药经典著作。《月王药诊》开篇道: “……五台山, 有五族、五大、五行、五毒、五种药物生长的中央山峰<sup>[4]</sup>”。这时藏医药学的“毒”和“药”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并且书中专门辟

出一章“毒症性相”介绍“毒”和“中毒”, 对“毒”和“中毒”已有基本认识, 初步上升到理论。《月王药诊》认为“毒分肉中毒、饮食中毒、药物中毒、合成毒中毒等”<sup>[4]</sup>4种。肉毒是腐肉; 饮食毒是不适宜的饮食和起居; 药物毒没有明确给出定义与范围; 合成毒主要是指宝石合成的毒、剑毒、梅毒等。此时“毒”与“药”虽已有所区分, 但二者区分的定义与范围较为模糊。“毒”除了具体的物质以外, 某些行为也认为是“毒”, 如饮食毒包括不正确的饮食和起居。

#### 1.2 发展时期

成书于公元8世纪末, 集藏医药理论之大成的《四部医典》云: “毒分和合毒与转化毒, 物毒自性毒等共计三类分”<sup>[5],370</sup>。

“和合毒”是指用各种有毒的药物配制的毒。“虽然上述各种皆入药, 主药使用茛菪配伍多。其中二合聚合转数种, 分类繁杂理解颇费难, 对治反则复次伤自身”<sup>[5]</sup>。指出茛菪为“和合毒”的主要药物, 提示在临床上使用茛菪治疗疾病时要引起高度注意。用药时对症则可以治疗疾病, 药物用反了就会中毒, 出现不期望的反应。

“转化毒”是因为食物搭配不当或者是进食方法不正确而导致的中毒。“转化毒症其中有两类,

\* 收稿日期: 2011—04—13 修回日期: 2011—09—15

作者简介: 王璞(1959~), 女, 山东人,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民族医药研究。

不适之毒再加肉中毒”<sup>[5],38</sup>。肉毒是腐肉。不适之毒是由食物搭配以及进食方法不正确产生的毒,可以认为是食物禁忌,包括食物配伍和服食禁忌。食物禁忌分为3方面,第一方面是被投毒食物的检验与反应。例如,放入毒物的食物,颜色和味道都有改变,用火烧则会出现孔雀羽毛般的火焰,火苗旋转、卷腾并且火星还会窜出如同跳跃一样。以此有毒食物喂狗,狗的肚子发热并且呕吐。如果肉中有毒,则会颜色较正常肉色发红且不沾在铁器上。将此肉与酒一起加热,蒸腾出来的蒸汽会熏得人眼睛灼痛。第二方面是饮食搭配禁忌。主要记载了不合同时食用的食物:生乳酪—新酿的酒(食酪饮酒中毒蜂蜜解,再饮凉水立效验之良)、鱼肉—乳类、水果—乳类、鸡蛋—鱼肉、豌豆菜—藏糖—奶酪、蘑菇—白芥子油、鸡肉—乳酪、蜂蜜—菜籽油、石灰华—蘑菇、醋酸—奶类。不可以食用的食物:放在铜器中10日的酥油、黄柏火烤的野畜肉、发白变酸的肉、在蒸笼下放了七日的熟食。第三方面是不良饮食习惯。不良饮食习惯也是产生毒的原因,例如熔炼酥油后饮冷水,上顿还没消化完又进食,吃不常吃的没吃过的食物,吃不和时宜的食物。

“物毒自性毒”又称为行与不行毒,是指植物毒和动物毒。“自性毒分行与不行二……不行草乌乌头与狼毒,赤芍商陆达布山枸奈<sup>[5],391</sup>”。意思为本身具有毒性的毒物分为可行走的和不能行走的两类。其中不能行走的毒也就是植物毒有:草乌、乌头、狼毒、黑白芫荽、赤芍、商陆、达布、山枸奈。可见《四部医典》时期较《月王药诊》时期对“毒”的认识更进一步,已把不同种类的“毒”分章论述。对不同的“毒”做了定义并罗列具体的毒物。

### 1.3 成熟时期

18世纪中叶,藏药学之大成的经典药书《晶珠本草》在药物起源中阐述了病源与药源,“毒”的内涵和外延都有论述,给出广义与狭义的“毒”。“毒孜”其含义有二:一是指甘露;另一解“毒”指毒和病,“孜”指解毒治病的汁液,是药,毒孜则指病和药,即医药<sup>[6],1</sup>。“飘游着的毒气化作动物和昆虫、疯狗、毒蛇、蜘蛛、蝎子等动物的毒。不飘游的毒气化作信石、狼毒、乌头、大戟、和芫荽等的根茎和土石之毒”,“分别化作动的毒

和不动的毒”<sup>[6],20</sup>。动的毒指:昆虫、毒蛇、蜘蛛、蝎子等动物的毒。不动的毒指:信石、狼毒、乌头、大戟、和芫荽等的根茎和土石之毒。《成就源续》中引用了《章松桑格语颂》之说:“十方宇宙聚毒精,摄入太阳火轮中,毒气化作各种病,共是四百零四种,因而称为疾病主妇”,因此毒和最初的病及其派生病,危害有机体的生命,称为“毒”<sup>[6],84</sup>。广义毒:危害有机体的生命的物质,称为“毒”。包括动物、植物根茎、土石之毒,和最初的病及其派生病。狭义毒:指甘露,解毒治病的汁液,是药。这一时期的“毒”与现代药物不良反应有类似之处。

### 1.4 完善时期

21世纪初,一本全面介绍古今藏药理论和实践的著作《中华本草·藏药卷》指出“药性包括性、味、毒性。……毒分大毒、小毒、有毒”<sup>[7]</sup>。毒性归在药性之中,对毒性的等级做了区分。《新修晶珠本草》对毒的记载为药物的毒性和副作用,并有药理毒理实验。这一时期的藏医药毒性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2 藏医药学减毒控毒方法

藏医药学对毒的减毒方法有其独特理论,下面整理了炮制和制剂减毒控毒理论的文献记载,并整理统计了藏药方剂配伍减毒的范例。

### 2.1 炮制减毒

《月王药诊》在炮制银时“用硃砂解毒”提到毒<sup>[4]</sup>。《四部医典》对减毒的记载较多。“佐塔”是藏医把含有剧毒的水银经过复杂的特殊加工炮制后,炼制成无毒而具有奇特疗效的药中之王。而对水银炮制减毒的实践方法始载于《四部医典》中。“珍宝热剂金银铜铁四,捶如蜂翅切割为小块,难摧注于铸模浇水银,再加硃砂硫磺浇注之,其口当用牛粪灰密封,其上再用泥糊煤火烧。其灰硫磺黑香大麻仁,小米辣与菖蒲三热药,紫堇降香贝灰共细研,水银五分沙棘一钱摧,诃子浸酒取汁加牛溲,煎煮收膏群药共相配”,“第一三热药与水银二,獐皮之内揉之使锈出,其后牛溲研而除锈液。出毒寒水石与童便煮,使于软质芫荽与胡椒,寒水石与黑矾和纯碱,适其病症适量配合之。”<sup>[5],435</sup>

《四部医典》记载的炮制减毒方法还有草剂减毒。“对其主要分支有七种:产地生与及时去采集,善为晾干新鲜与陈旧,出毒嫩软适于配伍等。

……药有毒性根茎皮髓毒，枝节之毒茎干叶之毒，花朵覆毒核骨果实毒。汁髓脂等三处无毒性，表皮之毒肌附中层毒，去毒药料柔软消化易”<sup>[5],423</sup>。草药一般有毒，入药时去毒非常重要。根入药的药物毒在外皮，因此要剥皮；茎木类的毒在杆髓；枝类的毒在枝节，茜草除外；叶类的毒在叶柄；花类的毒在花萼；果实类的毒在果核；皮类的毒在于污垢。除去毒性的药物，其性温和，疗效高，容易消化<sup>[2]</sup>。《晶珠本草》多次提及药物有“毒”，如金、红铜、铁、锡、番木鳖、桃仁、唐冲、榜阿那保，同时提出“不去毒不可入药”或者“入药需去毒”的炮制论述，例如：水银、硫黄石、麝香、茶子、沉香、旺拉、狼毒和泽漆等。《中华本草·藏药卷》中记载“炮制去毒”的藏药共有9种，分别为水银、金、铅、硫黄、大戟、黄精、瑞香狼毒、乌梢蛇和竹叶青。“去毒”做为炮制步骤之一的有金和铅。炮制目的仅为“去毒”的药物有硫黄、大戟、瑞香狼毒和竹叶青等。

## 2.2 制剂控毒减毒

《四部医典》在丸剂中讲到“解热除去毒性水银外，虽然没有解热之成药，对症下药揉制丸可用。此等丸剂配伍细研之，无引诸剂湿捣烂如泥，既细揉制犹如小豆粒。毒性为主其丸宜极小。若配药引不需稀释制，制如羊粪或者冰雹粒，小丸吞服大丸嚼之宜”<sup>[5],424</sup>。认为去毒的水银有毒可以解热；规定毒性药物为主的丸剂要做成比小豆粒还要小的“极小丸”。以便于严格控制有毒药物的用量，这与现代药剂中的观点非常类似。

## 2.3 配伍减毒

整理藏药文献发现，其减低药物毒性的另一方法是药物之间的配伍应用。

搜集整理了《月王药诊》、《四部医典》等藏药文献中近70首藏药处方，发现具有毒性的乌头类药物用量较大，而往往同时配伍较大量的诃子。整理结果举例：治疗赤巴病时，诃子与乌头的用量比是2:1；治疗培根病时，诃子用量是船形乌头的3倍；治疗风湿，诃子的用量一般是草乌的1~6倍。还统计了消化不良、流感、喉蛾、痢疾、急

性黄疸、头颅疾病、胃病、风湿、胆囊炎等治疗处方。近70首藏药处方中乌头配伍诃子的情况统计结果如下，诃子的用量常常大于乌头，大约1.5~6倍，而诃子与乌头的用量都较大，大于50g（40首方子）。同时，在少量处方里，诃子与乌头的用量相等，在个别处方中诃子的用量大约是乌头的二分之一。可见如此配伍的意义，不能排除是利用诃子缓解乌头的毒性。通过现代药理分析，发现诃子的主要成分为鞣质，鞣质对乌头类药物中的生物碱在理论上有一定的解毒作用，可以认为这是对藏药配伍解毒的一个佐证。

## 3 讨论

通过对藏医药学经典文献的系统整理，归纳了藏医药学毒性理论逐步发展完善的4个时期，即萌芽、发展、成熟和完善时期。藏医药学对“毒”的定义和分类有独到见解。减毒思想在《月王药诊》时期出现，在《四部医典》时期有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藏医药学“毒”与药的关系密切，进一步研究藏药“毒”与藏药不良反应的关系对现代藏药的安全使用有重要意义。

### [参考文献]

- [1] 宗喀·漾正冈布. 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0世纪的西藏医药学纪年[J]. 中国藏学, 1997, 4: 96.
- [2] 土旦次仁.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学[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2, 193.
- [3] 格桑次仁. 藏药不良反应初探. 中国民族药杂志[J], 2007, 4: 27-28.
- [4] 马哈亚那, 马世林, 王振华, 毛继祖译. 月王药诊(汉文)[M].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3: 导言, 115, 267.
- [5] 宇妥·元旦贡布, 李永年译. 四部医典(汉文)[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3: 370, 388, 391, 435, 423, 424.
- [6] 晶帝玛尔·丹增彭措. 晶珠本草[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前言, 20, 184.
- [7]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 中华本草·藏药卷[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凡例.

(编辑: 左媛媛)

(英文摘要见第58页)

条经络的具体循行路线时即可将前学习过的穴位连接线,大大降低学习经络学内容的难度。因为经络在人体的循行部位,比之腧穴的定位更不容易准确描述。(3)由于学生已经提前学习完中篇针灸学内容,因此学生在学习了腧穴学的内容后即可在实体上进行练针,熟悉手法,体会针感,大大提高学习效果。实体练针,可自己试扎或同学之间相互扎。熟练掌握针刺技术的针灸医师在开始学习针灸时,大多数都有自己试扎或相互之间互扎的过程。于是乎在针灸领域还有“宁在自己身上试扎千针,不在患者身上错扎一针”的俗语。

### 3 《针灸学》“双前法”教改的可行性

以临床实践为主,在临床实践中传承学习,是古代中医学(包括针灸)的主要学习方式。“双前法”教改可以较好体现这种学习方式。由于《针灸学》“双前法”教改仅仅是对授课内容顺序上进行调整,无需花费较多的人力物力重新编写教材;《针灸学》授课教师也无需重写讲稿、教案。由于刺灸学、经络学、腧穴学等内容具有相对独立性,提前讲授刺灸学和腧穴学内容不会对学生学习后面的知识造成影响。

### 4 《针灸学》“双前法”教改的难点分析与建议

由于授课内容顺序打乱,教师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对授课的方法与技巧也需要进一步总结提

高。先讲经络后讲穴位是“从线到点”的认识;先讲穴位后讲经络是“从点到线”的认识,教师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是对教师授课水平和技巧的考验。因此,授课前教师要有“一盘棋”思想,认真安排和调整好教学内容。

由于将腧穴学内容从经络学中拿出来提前讲授,对教学进度把握会带来一定困难。因此,授课前教师要认真分配各部分教学内容的授课学时并严格执行之。

提前练针、提前认穴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能有更多时间进行实践,因此,教师需要经常指导督促学生多练针、多认穴,进而达到熟能生巧的程度。否则,就会失去“双前法”教学改革的意义。

提前练针、提前认穴,虽然打乱了原来按部就班的授课内容顺序,但是也为灵活讲授该门课程创造了条件;同时还可让学生边实践边学习。目前大多数课程的讲授方法均以课堂讲授为主,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是当前课堂教学存在的最大弊端。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就要不断探索和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 [参考文献]

[1] 石学敏. 针灸学 [M]. 1版.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2.

(编辑: 迟 越)

(原文见第18页)

## A Literature Review of Toxicity Theory in Tibetan Medicine

WANG Pu, DONG Yan-fei, WU Jia-rui, SHENG Xiao-guang

(College of Chinese Pharmacy,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safety of modern Tibetan medicine application by literature researching of toxicity understanding in Tibetan medicine. Methodology The study begins with classical literatures of Tibetan medicine and discusses the appearanc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poison in the Tibetan Medicine. It also systemically combines and presents different kinds of theories. Results Tibetan medicine has its unique understanding in toxicity theory. There are four periods including appearance, development, finishing, and perfection.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poison and attenuated theory will be discussed in detail. Conclusion There are three main realizations of the poison in the Tibetan medical Classics, such as drugs come with toxicity; toxicity is the bad substance and form of which results in human disease; Toxicity is negative effects of drugs.

[**KEY WORDS**] traditional medicine; tibetan medicine; toxicity; literature